

“求富——治本”：后期洋务思潮的新模式

李 双 璧

1 洋务派在近40年的“新政”实践中，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自强”，就得造船制械，就得发展军事工业；要想发展军事工业，就得广辟财源，兴利求富，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此即马建忠所说的：“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① 洋务派首脑人物们认为，兴利求富不仅具有裕饷开源的意义，且有“分洋商之利”，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意义，李鸿章就说过：“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②

“自强——求富”这一近代化模式的实现，必须以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瓦解为前提。当整个社会形态仍处在中世纪时期，政治结构、经济组织以及人们的价值系统仍是传统而非近代之时，急功近利地“求富”便只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所以，从逻辑角度看，李鸿章等人以纾燃眉之急的“求富”虽无过错，但从社会进步角度看，这种“自强——求富”模式却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

急功近利地“求富”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其表现是：军事工业始终居主导地位；兴办企业的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兴办人多为政府大员；由于企业的经营大权掌握在对近代工业管理全然外行的官僚手中，技术管理多依赖不尽称职的“洋雇员”，以致造成大部分企业刚创办即难以为继的局面；洋务企业的产品多由国家调拨，这种经营方式严重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和窒息了经济生活中的创造力。洋务派官僚不可能触动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封建经济制度，而少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当然也不会引起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朝廷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企业的兴办往往是想到就办，旋起旋灭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只重视对国外设备、技术的引进，不重视先进的管理科学的学习和人才的培养。在洋务企业中，缺乏健全的近代审计制度和财会制度，管理混乱、中饱私囊的现象所在皆是。然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人，却对洋务“新政”的实际情况缺乏清醒的认识。光绪十七年（1891），在李第一次巡阅北洋海军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还自得地说：“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成军以后，现届三年…规模略具。…实为前次中国所未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③ 实际上，由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这支舰队七年未添一船一炮。此后，甲午一战，北洋海军竟全军覆没。可见，洋务“新政”表面壮观，实际上却问题成堆。当时有人就提出这样的疑问：“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仍如故也？”^④

2 1884年的中法战争是洋务思潮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中法战争的实际考验，证实了“自强——求富”模式存在着许多问题。洋务“新政”实效不显的现象已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注意。洋务运动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们，如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邵作舟、郑观应、汤震、钟天纬等人，益发不满意洋务派官僚的以军工为主体的“自强——求富”模式。他们或猛烈抨

击,或委婉批评,或提出新的建议,或着眼于新方案的实施。他们主张:改革必须深化,“求富”必须赋予新的内容。这是因为他们看透了所谓“同光中兴”“盛世”的虚假性;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实行经济领域的彻底改革,并希望在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里进行变革;他们的思想范式虽未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但已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批判意识。

大多数洋务思想家都是洋务活动的参与者,其思想言论较多地反映了“新政”实践的需要,具有很大的实践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些意见甚至直接为主持“新政”的洋务官员所采纳,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郑观应等人的某些理论观点已远远突破了封建社会“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模式,提出了一些旨在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主张。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与其说是晚清洋务“新政”的理论总结,不如说是强烈要求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性表现。他们代表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改革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个阶级强烈表现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最初呼声。在中法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十年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具备的物质条件确已形成,一个新的阶级、一股新的社会力量确已发育,一种新思潮,即“从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的形态”^⑤已在郑观应等洋务思想家那里得到充分反映。

3 薛福成、王韬、马建忠、郑观应是这批思想家中论述经济问题较多的几位。他们的经济改革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主张以“工商立国”,强调“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重要性。王韬在批评朝廷的“抑商”政策时说:“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他认为,惟有“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才能“国强民富”。^⑥他还提出了“恃商为国本”^⑦的口号。薛福成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做到“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行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⑧他力主改变社会上贱视工商业的风气,甚至认为:“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⑨马建忠力主尽快扭转外贸逆差,以增加出口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他指出,“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是造成中国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制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成立公司,“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提高出口货物的品位质量,减轻厘税,设立商务衙门等,以增加出口,使“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⑩当过外国洋行高级买办的郑观应,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性的认识更清醒、更深刻,他说过:“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⑪因此,他主张“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⑫。他所谓“商战”,不仅指注重商业的发展,且指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在郑观应看来,“以商立国”^⑬的方针,具有指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为此,整个国家的政策,都必须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基点,“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⑭为此,郑观应要求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经济特权,制定“保商之法”和革除“困商之政”。具体措施则有颁订专利法,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抑厘卡,鼓励民间开矿、办厂等等。

此外,他们在强调科学技术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中的作用,成立各类新式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要求政府制定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法律等方面,都有十分精湛的论述。这些思想无疑是洋务思想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的发展;是对一般意义的“恤民”、“养民”之说和“造船制

械”方略的重大突破。

第二,在主张“官商势合”,肯定“官督商办”经营形式的同时,也批评了传统社会压制、破坏民族工商业的作法。薛福成认为,促使商人“挟货而往者踵相接”的精神动因是“人人之欲济其私”,这种资产阶级的谋利之心,“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大利”,这是因为民富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强。因此,他力主“用局中任事之商,兼招殷实明练者,量其才力资本,俾各分任若干埠。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不仅如此,政府还应“恐商情之相轧也,则督以大员而齐其政令;恐商利之未饶也,则酌拨漕粮而弥其匮乏。”^⑤这是后期洋务思想家较早论述官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点。马建忠也曾提出,中国应尽快成立一个商务衙门,“然后由商务衙门向外洋各国贷款二三千石,其契据或自行出名,或另立华商总公司出名,专办商务。”^⑥他认为,西方“商人互相借贷,皆可亲理,而无事取信于其国之官”,中国则不然,“以借贷不得不凭官以取信,……国家为之担保,则外洋富商无不乐从”,因此,要使民族工商业得以振兴,必须“君民一体”,“联官为一气”。^⑦薛、马一方面批评清政府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厘金制度、关税制度,以及种种勒索摊派行为,一方面又要求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希望国家对工商业“设官以经理之,又立法以鼓舞之”。^⑧这是一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却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新思路。

从事过实际工商业活动的郑观应对此体会尤深。他认为,在中国,要想兴办近代化工商企业,“官督商办”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好办法,这是因为,“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⑨这表明中国资本主义在初期发展阶段不得不走上一条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艰难路径的苦衷。中国是一个以“官”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国家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而“官”的作用和影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目标的特性就必然反映到实际经济活动中来,而撇开这一基本前提的任何变革方案,只能是不合时宜的幻想。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官督商办”的肯定,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

但是,“官督商办”毕竟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其弊病渐趋显露。郑观应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求技艺,深求格致,并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腴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⑩为此,他主张,兴办新式企业“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⑪所谓“商贾之道”,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则和客观规律。然而“官督商办”的弊端在一个以官为本位的社会环境里,是无法根除的。“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雀成怨府。”^⑫郑观应在甲午战后,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其思想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必须再向更深一层次进行,“自强——求富”模式必须发展成为“求富——治本”模式。这说明,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洋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维新思想。

4 本世纪初,郑观应说过这样一句话:“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⑬的确,在中国这块荆棘丛生的荒野里,很难设想资本主义幼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政治不改良,实业无以兴盛,就是兴盛了,也会遭到挫折,——这几乎成了所有洋务派人士的共识。不同的是,洋务运动后期进步思想家的政治改革思想早已突破了“修政事,求贤才”,(曾国藩语)的理论框架,已经显

露出资产阶级参政意识和议会政治理想的端倪，不再是与“经世致用”思想同一层面的简单重复，而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与西方政治制度表层观感的粗糙结合。他们认识到，近代化不仅是辟富源，开利藪，而且是政治上的“治本”——“得民心”。为此，必须通上下之情，必须改革官制，广开言路，重新调整君、官、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适应“自强之道”的总体要求。王韬在《上当路论时务书》中说：“今日时务之急，首在乎收拾人心……西国之所以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善于治民者莫如英，……治国之道，先在养其元气，如西国之法，斲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④这可看作是洋务运动后期进步思想家政治变革思想的起点。但他们据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础理论仍然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他们要求改革官制的目的，不过是通上下之情，养国家之“元气”。因此，“西学”、“西法”只能起着“相辅而行”的作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比较而言，英国的“君民共主”制度似乎更适合于中国国情，因而能够“行之久远”。

洋务运动后期进步思想家们普遍认为，惟有“君民共主”政制才是最好的“治本”良方，是以“西法”辅“中体”之不足，“斟酌得中”的变革方案。其最大功能在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⑤为僵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注入新的活力，使之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正常运作。王韬在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制作了比较之后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愈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⑥应该承认，“君民共主”的思想比起传统的“君临天下”、“庶人不议”君主专制主义思想体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从而使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基石发生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君民共主”思想确有其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

“君民共主”思想具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就是要求设立英式议会。

盛宣怀曾写信询问郑观应：“变法以何者为先？”郑当即复信表示，当务之急就是“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议院设立的最大好处即在于建立一个“公是公非”的合理的社会机制，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一体”、“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分析“上下相通”的时候，不是指传统的民情上达，在说“上下相通”的时候，不是指传统的民情上达，君恩下逮，而是指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消融化解和使“民心固结”的良好政治环境，这里所透露的依然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路向。他的议院观始终是建立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民本思想基石上的，这就是所谓“议院乃上古遗意，固非西法，亦非创辟之论也”。^⑦于是，相当激烈的“设议院”主张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找到了合乎“圣道”的理论依据。

正因为如此，郑观应和其他洋务思想家们所设想的议院只具咨询博采的性质，所设计的种种议院形式不过是原来封建政治机构中翰詹科道的变通。他们不提民权，也不提宪法。罗列议员之职的只能是各级封建官僚、士大夫和乡绅，而不是工商业者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对封建君权的某些限制，政治生活有一定的透明度，而不是整个国家政治机器的重新建构。这种性质的“议院”，与英、德等国的君主立宪代议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5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政治改革思想里，更多的是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

“求富一治本”，后期洋务思潮的新模式

59

是传统而不是“西政”。

郑观应在分析“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②时说：“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下飭督、抚……以一纸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耳目，此外寂无举动矣。”^③解救之方就是“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④而“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⑤所以，重要的不是议院形式，而是“通言路，举人材”；关键不在于权力再分配，君权限制，而在于改变官场积习，“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借公法以维大局。”^⑥郑观应一再强调：“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⑦“议院乃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必民皆智慧，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⑧这就是郑观应“议会观”的实质内容。

郑观应的看法在洋务运动后期思想家中很有代表性，薛福成就这样说：“是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然则果孰为便？曰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无或便。”^⑨可见，他们始终不曾真正了解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精神实质，只是将“议会制”视作一般意义上的变革举措。

这批思想家们的变革思想和改革方案，较之洋务派官僚们来说，虽有进步，但其基本的思想范式，仍然是“中体西用”那一套。近代中国的变革，与以往历代的“变法”，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政策调整 and 措施改易，它是一次波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剧烈震荡，是一次革故鼎新的历史转型，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重建。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充满痛苦、步履蹒跚的过程。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除了极少数进步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严峻程度和深刻意义外，绝大多数人还依然浸淫在传统文化的迷梦之中，“不顾事机之顺逆，不计饷源之盈绌，则亦虚骄之议论积成习尚，貽累天下国家之尤者也。”^⑩就是洋务派自身，也未曾对传统的永恒价值产生过怀疑和动摇，相反，他们实施“新政”的目的只是为了确证这一中心价值系统和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当时，这个口号确已代表了思想界的最高水准，是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因为他们毕竟承认西方异质文化确有可“用”之物。

迨至中法战争以后，惨痛巨创的现实再一次刺激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神经。他们开始意识到，所谓“西学”，恐怕还不仅仅是“制器尚象之法”。于是，他们的“中体西用”观念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极其狭义的“体用”扩展为较为广义的“体用”。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临终前醒悟道：“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软？”^⑪这表明，张树声终于认识到了西方文化除器物层面值得首肯以外，还有制度层面的学堂和议院。可见，洋务派在进一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涵，使改革向着更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

洋务运动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们适应了这一需要，他们在不违背“中体西用”总原则的前提下，适时地提出了变“求富”为“治本”——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通盘设计到重新调整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改革主张。虽然他们主张的“治本”，也就是重新诠释过的，赋

予新内容的西学——“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仍然与西方文化之“体”有很大的距离，但他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西方文化原来也是一个整体。西人立国自有体用，“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凡有性必有情，有体必有用”，^⑤这就把“道”与“器”、“体”与“用”的从属关系从哲学的高度上升为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而不自觉地摆脱了创自冯桂芬之手^⑥、渐成新传统的“中体西用”观的羁绊，为尔后的维新派彻底否定“中体西用”说，主张尽用西法，实行制度层面的全面改革作好思想铺垫。

从“自强——求富”模式发展为“求富——治本”模式，竟然需要十年的时间。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的演进是如此地艰难，中国人知己知彼工夫的养成，是如此地曲折。尽管“求富——治本”模式是求得中国历史进步而不懈地探索的必要的一环，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维新变法重任还是不能落在洋务运动后期思想家的肩上，因为从民本到民权、从治民到民治、从人治到法治，还需要走一段艰苦的路程。甲午中日一战的惨败，终于使进步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飞跃，“求富——治本”思想模式很快被推到了历史后台，但其思想影响仍然源远流长，其正面和负面效应都不能低估。

〔责任编辑：林建曾〕

注：

- ①⑨⑩⑪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一”，《戊戌变法》（一），第163—164页。
- ⑫⑬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32页；72卷，第1—4页。
- ⑭ 王韬：《变法自强下》，《戊戌变法》（一）第142页。
- ⑮ 章鸣九：《洋务运动后期进步知识分子的改革思想》，《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 ⑯ 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第85页。
- ⑰ 王韬：《代上广州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第300页。
- ⑱⑲ 薛福成：《筹洋刍议》，《薛福成选集》，第543页，541页。
- ⑳ 薛福成：《英吉利利用商务辟荒地说》，《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6、614、597、704、609、612、339、339、331、313、329页。
- ㉠ 薛福成：《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薛福成选集》，第367页。
- ㉡ 郑观应：《商务叹》，《罗浮侍鹤山人诗草》卷二。
- ㉢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叙》。
- ㉣ 《戊戌变法》（一），第149页。
- ㉤ 陈炽：《议院》，《庸书》，同上书，第245页。
- ㉥ 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
- ㉦㉧㉨ 郑观应：《答某当道设议院论》，《郑观应集》上册，第322—323、324、324页。
- ㉩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选》，《薛福成选集》，第605页。
- ㉪ 郭嵩焘：《因法事条陈时政疏》，《郭嵩焘奏稿》第410页。
- ㉫ 《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 ㉬ 郑观应：《道器附言》，《郑观应集》上册，第244页。
- ㉭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为近代“中体西用”说之嚆矢。（详见《戊戌变法》（一）第28页）。